

作者的話

1990年代末，在香港的一個小山村樟樹灘，再見王小強。一場風暴之後，他留英回來，退出主流，幾成隱士，唯研究國事天下大勢，依舊全身投入，自嘲有病，先辦《參閱文稿》後辦《香港傳真》，依舊是民間傳統，在野精神，還不斷向老友們重複自己的「生命機會成本說」。亞洲金融危機，日本大叫「亞洲有事」，我在日本有年，也順口談些日本觀察，在他的鼓勵下，陸續寫了出來。一晃十年有餘，陸續在《香港傳真》印些文字，居然可以系統整理，結集出版，照南懷瑾老師的說法，確是借了小強的光。

早已遠去的1980年代，被稱為「新啟蒙時代」。北京的學界圈子，似乎主要有兩種不同傾向。一是立足於中國的實證研究；一個是學習西方。我所參加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，代表著實證研究的那種傾向。「發展組」當年的口號是「多學科、高層次」為改革服務的政策研究，目標方法，十分明確。其實那種實證，並未忽略吸收國外的經驗知識。1985年「體改所」組織過一次全國性調查，總報告題為《改革：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》，集體寫作，小強主筆，開首就講，中國一面受成熟的歐美市場經濟體制之苦，一面受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之苦。我所在的社會政治室參加了這個調查，

分析勞動力、福利、社會保障的三位一體的構造問題，在「兩苦」之間，尋找市場和社會保障、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點。日本模式中的「產業政策」、「終身僱用」之類，引起不小的興趣，並且常常延伸到「日本和俄國現代化」的話題。

學習西方的另一種傾向，激發起 1980 年代的「新啟蒙」，《讀書》雜誌和《走向未來》為其傑出代表。在包遵信、金觀濤等主持之下，《讀書》常有討論會，因為投過幾篇稿子，有緣參加一些會議，結交不少朋友。那時候，還沒時興名片，眾人大侃一通之後，往往找個小店吃飯，再拿個本子或者紙條互留姓名。1984 年初，到蛇口工業區參加研討會，由何維凌引介，在船上和老包、金觀濤說起自己在研讀韋伯著作，可惜沒有譯本。後來由王焱負責，從帕森斯的英譯本，與人合作翻譯韋伯的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，收入《走向未來》叢書，並寫了一個書摘，發表在《讀書》1986 年第 1 期。為了系統地引進西學，維凌主持為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《現代社會學比較研究叢書》，我做具體工作，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社會學著作。

提起陳年舊事，無非想說這本《方法的日本》，源於這些舊事的影響。筆者與日本素無淵源，研究日本屬半路出家。1989 年到東京大學，想做一個改革與日本模式的課題，同時學習日語。此前，有一年多在國際大學讀書，那裡是美國式的研究生院，教學全用英語，說道日本，倍感隔膜。沒想到，機緣意外，到東京而成「滯在」，比較研究而成「參與觀察」，柴米油鹽，衣食住行，從頭來過，其中艱辛不足道，大抵有過洋插隊經驗者皆可想見。寂寞與無奈之中，奔忙勞碌夾帶遭人白眼之餘，讀書人的痼疾，難以放棄讀書寫字，加之參與觀察，也許比之於隔膜中人多了些許直感。

初到東京，正趕上日本泡沫輝煌。看電視節目練聽

力，不少在討論股市樓市行情。印象深的是那種搶答題。問：哪兒的地價世界第一？答：銀座某處地王。問：東京的地價相當於美國加州，還是美國全土？答：美國全土。經濟動物日本，到此可謂全盛，湧動著一片暴富的浮躁氣氛。日本以製造業和貿易立國，貿易黑字，外匯儲備，「日本世界第一」，據說「威脅」到了美國的戰略利益。報刊登了不少「日本收購美國」和「打擊日本」的文章，電視展示美國人砸日本家電和汽車。中國人不在日本的視野之中，豐田汽車拒絕在中國設廠，中國製造的鞋和衣物，扔在百貨店外邊的筐裡。美國大學流行學習日語，精通日語的美國人成了日本的電視明星，顯身說法，大約使日本人的虛榮心極大滿足。緊接著是美國的一系列對應，美日關係大變局，也是本書一些章節分析的內容。

一位中國領導人，訪日親民，讚賞日本「電車」（城鐵）裡人人讀報，個個看書。的確，這是一個良好的習慣。每天擠電車上下班，我也一樣，因為不能打電話，更不能高聲說話。日本這個國家，就像一輛滿員電車，人人都在埋頭自己的事情，至於電車奔哪裡開，卻盲人瞎馬。泡沫破滅的時候，「日本電車」出了車禍，個個猝不及防，社會亂像疊出。也許是慘烈的戰敗，讓這個民族學會了處變不驚？蕭條之下的日本，依舊按部就班，內心的掙扎都在失業率、過勞死、自殺率一類冰冷的數字裡，連新宿車站地下不斷增加的homeless，表情也是平靜的。不平靜的是政治和對外關係。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分裂，只好與其他黨派聯合執政，政治舞臺上角色變換不斷。其中小泉內閣奉行新自由主義，推行「構造改革」與美國「接軌」，一時贏得一片叫好，還有選票。不過，好景不長，改革無路可走，自民黨終成野黨。

所謂「方法的日本」，也是將中國與東亞的歷史，連貫起來的思考。中國改革初期，學習過日本模式。在推動

改革的老一輩的回憶中，日本的高速鐵道、公路、汽車的發達，出口導向政策，甚至於威權主義的政治，都得到關注和參考。轉瞬之間，那個時代，已成過眼煙雲，統統落伍。1990年代初，冷戰解體，美國式資本主義全球化，世界各國統統接軌轉型，忙的一塌糊塗，中國，日本，都與美國「接軌」，苦於總是接不上。美國金融危機，突如其來，大約才發現「接軌」的漏洞百出。日本在「親美入亞」、「脫美入亞」的軌道上徘徊，最終的道路，大約取決於「中國世界」的復興，而這個復興需要一個「亞洲的文化革命」。

亨廷頓文明衝突，將中國文明、日本文明分列。差異俱在，但是，是否為另外一種文明？存疑。中國是日本的「希臘羅馬」，那是史實。除了切身觀察之外，筆者自修日語，讀了不少日文書籍。日本越老的書，漢字越多；越老一輩人，越通漢學。至於古籍，則全用漢文。不習漢字，幾乎無法學習他們自己的歷史。日本出版業發達，東京神田一帶有個書店街，各種專業舊書店，一家挨著一家。喜歡逛書店、尤其是舊書店的我，就從那兒開始購書，全是便宜貨，包括一批學術經典。《明治漢詩》就這樣發現。國內沒有專家寫過，於是選編了一下，加上一篇序文和人物介紹發出，這次也附錄在書裡了。

在學校呆了幾年之後，為了養家糊口而入「商社」，業餘時間，繼續研究。因此，寫一篇稿子，花很長時間。〈日本改憲〉一篇東西，花了兩年多。學會電腦寫作，把一些資料帶在身邊，走到哪兒寫到哪兒。有的是在東京辦公樓，那裡有個不錯的圖書文獻室；千葉船橋的社宅，附近有個很好的圖書館；有的是在國內出差途中，山南海北。每到當大學教授的朋友的研究室，見人家四壁皆書，寧靜書齋，不免心生嫉妒，可惜自己沒福。不過，儘管業餘，寫作還是認真的。中信泰富研究部的諸位更認真。一

個美國退任大使，批評民主黨小澤一郎關於美日同盟的言論，發在《日本經濟新聞》上，我註釋的日期有誤，張幸仔幾次來電詢問，非找到原始的剪報才罷。楊瑩、梁曉，還有北京《中國稅務》雜誌社綜合研究組的幾位，都幫我編輯過文稿，這裡一併致謝！還得感謝老母健康，感謝妻子小惠，女兒豆豆、東東，十幾年來北京、東京、上海，隨我到處奔波，聚少離多，原諒我不問家務。

感謝承志先生的序言，他從自己的角度描繪著「歸亞的方向」。他的〈魯迅路口〉是我最有共鳴，也最喜歡的散文，又因為《香港傳真》得以和他結識，當然我早就讀過他的不少作品，在日本卻沒有見過面。日本問題的討論，山南海北的聊天，相似的日本經歷，相近的社會和人的觀察，他的《敬重與惜別》的兩個詞，也許最好地概括了共同的日本觀，只是，在他那裡，亞洲不止是我所關注的東亞，還有更加廣闊的伊斯蘭世界，中亞、西亞、阿拉伯、巴勒斯坦。

最後，這個拙劣的集子，能在大風出版，筆者倍感榮幸！這個出版社，老中青三人行，南懷瑾老師題詞，王小強主編，楊瑩社長等人編輯、製作、發行。每出一書，必先讀為快，有的書竟至於洛陽紙貴，風起雲揚。筆者忝列其中，自慚形穢。得南懷瑾老師、王小強老友厚愛，算是遊歷歸來的一個交待，以此就教於讀者。

著者謹識

2011年1月15日